

# 羅光——百年東西一旅人

陳方中

## 一、湖南教友羅光

羅光總主教自述生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一位在他身邊多年的秘書說他真的生日大概是在民國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幾日，以前的人以陰曆算時間，說不清楚究竟那一天，羅光自己就定為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理由是好記，也因此羅光與民國同生。

在他的回憶中說得不多，衡陽南鄉羅姓家大概到羅光為止是五、六代的教友，羅光花較多的篇幅描述他的祖母郭氏，郭姓是住在衡陽北鄉的教友世家。在他的記憶中，祖母才是信仰的核心。無論如何，他們是一個有虔誠信仰的天主教家庭，表現虔誠的方式，主要是以每日的唸經祈禱，以及參與主日彌撒及教會節日。

從一八四零年以後，湖南湖北是義大利籍方濟各會的傳教區。這是十九世紀以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常態，每一個代牧區或監牧區係由某會

某國某省的傳教士負責；在此傳教區中沒有其他會的傳教士，另有屬於教區的國籍神父。衡陽原屬於長沙代牧區的範圍，直到民國十九年才劃分為衡陽代牧區，但衡陽代牧區實為湖南天主教教會的核心，教友人數最多，傳承時間最久，而羅光就屬於這個老教友群體中的一員。

辛亥革命前夕，兩湖是改革派重鎮。從改革到革命，其實只是一線之隔，端看參與者所持態度而定。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進入長沙後，因為國民革命軍當時是國共聯合性質，原來潛伏的共產黨迅速的在湖南各地出現，開始推動「土地改革」，進行「階級鬥爭」。羅光對此有鮮明的記憶，他說：「共產黨在鄉裏組織農會，鄉町平日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帶頭大喊打倒土豪劣紳，把鄉裏幾個地主和有聲望的人，綁架起來。……後來雖然清黨，共產黨斂跡，但是匪軍竄來竄去，故鄉再不安寧了。」這是當時中國人生命經驗的共同寫照。

## 二、修士羅光

衡陽南鄉有毓德小學，城中有仁愛小學，皆為天主教學校。羅光自幼先唸毓德小學，後毓德小學停辦，羅光乃去城中念仁愛小學。以後仁愛小學畢業，遂在民國十二年，進入黃沙灣聖心修院，成為一名小修生。對於聖召的過程，羅光自己的敘述是：「向西湖中學報名，……我因英文不好，沒有考上，乃投考新民中學，得被錄取。……伯父嫌學校不好，提議我進修院，獻身教會。」這段看似平淡的敘述，顯示羅光不排斥成為一名神職人員，但他是尊長輩之意做了這樣的選擇。畢竟在這樣虔誠的老教友群體中，自幼會唸書的羅光，若成功的修道晉鐸，也是一件光耀羅家的事情。

前已提及，在民國十五年後湖南多事，羅光在聖心修院的日子並不平靜，除了兩三次逃避兵災外，羅光見過的第一位中國主教是蒲圻代牧成

和德，成主教是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來華後首批祝聖的六位中國主教。民國十七年柏長青（Raphael Pallazi）被祝聖為長沙代牧區的助理主教，邀請成和德來襄禮，成和德旅途中患病，在柏長青祝聖後三日死於衡陽。（作者按：羅光自己的回憶是因衡陽代牧區設立，但實際上衡州代牧區要到民國十九年六月才設立。）

民國十八年小修院結束，當時兩湖的方濟會士，一起在漢口設立大修院。柏長青主教派修生郭藩赴羅馬傳信大學深造，與羅光等一批修生同行往漢口。抵長沙後接到剛恒毅電報，請柏主教再派一位修生往羅馬，羅光在此情況下被選中赴羅馬唸書。他到了漢口，三天後就動身往上海，這年十月自上海動身赴羅馬傳信大學，從此之後未回中國。

羅光的這些際遇都與剛恒毅有關，剛恒毅是民國十一年被教廷派到中國的宗座代表。雖然不是正式的外交使節，但其實與外交使節無異。

羅光用輕鬆的語調敘述自己在羅馬求學的過程說：「教授用拉丁文授課，聽課並不困難。」一九三一年四月教宗庇護第十一至傳信公學行祝聖校舍禮，他興奮的描述了他參禮的過程，他記載了教宗向傳信大學校長問：「中國學生是二十五個吧！」這個記載顯示了庇護第十一對中國教會的注意，也顯示羅光意識到，他已躋身於羅馬所培育的中國教會精英之列。

### 三、羅光司鐸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羅光在傳信大學晉鐸。一開始他因為要攻讀法律學位，留在羅馬；以羅光的遠大志向，他不甘心晉鐸後就返中國。其後因原訂接任傳信大學中文教授的中國神父不克前來，傳信部乃委羅光任傳信大學教授，乃使其留居羅馬更名正言順。他自己說：「晉鐸後，我在母校又住了七年。」

這位留居羅馬的中國司鐸，主要工作是擔任

教授職務，其次是他的法律博士學位，但他沒有忘記他的司鐸身份，每天有祈禱、唸玫瑰經、誦日課、省察等本份，還在平日清晨至一修女院做彌撒，主日則在居所附近的本堂行祭聽告解。這是羅光的生活態度，他絕對是一位善盡本份的神父，別人對他無瑕可指。他也是一位規律的司鐸，他將每日、每星期、每月的時間均安排妥當，使他在各種身份間能轉換自如，不生干擾。

雖然這種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但羅光沒有忘記他是中國神職的精英，雖已有教宗代表駐華，但教廷遲遲不能和中國建交，是中國地方教會的重要遺憾。羅光注意到陸徵祥這位過去的外交總長、國務總理，此時是本篤會修士，在比利時布魯日隱修，他早在仍是修士時，就開始與陸徵祥通信。在此過程中，對外交實務長了不少見識。

另一方面，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蔣委員長請于斌主教往歐美進行國民外交，于斌亦籍此時機，希推動梵中建交，在此背景下，當教宗庇護

十一世，在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去世後，羅光第一次參與了中梵外交。

在《陸徵祥》傳中，羅光敘述了當時的經過。他說：「三月一日，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被選，各國政府立即預備派遣特使，參加三月十二日加冕大典。我急函興老（按：陸徵祥），懇他設法電請中國政府，派使參禮。並以顧維鈞大使或錢泰大使為宜。」陸徵祥贊成他的計劃，於是請中國駐波蘭公使致電中央，派特使團往教廷祝賀。駐法公使顧維鈞所率的特使團在三月十一日抵達羅馬，羅光在當天日記輕描淡寫記載了他參與的教宗加冕典禮，他沒在那篇日記裏寫下此事有其建議之功，但從此他已從一位關心者成為中梵外交的參與者。

羅光對中梵外交的實際參與，是中國駐教廷使館在民國三十二年一月正式設立後，首任公使謝壽康聘其任「教務顧問」的原因。這時的羅光尚未達到獨當一面的地步，他還只是一位重要的

協助者。于斌主教在政府及教廷中的人際關係都超過羅光，剛恒毅當時擔任傳信部秘書長，參與了更多教廷決策；陸徵祥對外交事務的專業及對中國外交實務的理解，都是羅光尚需學習的。但這些人對中國教會的發展有共同一致的看法，而羅光也在這過程中，如海綿一般學習了眾人的經驗，並建立起屬於他自己的人脈。

羅光在這種次要的身份中，參與了數件中國教會史上的大事。一是教廷在戰後正式派遣使節駐中國，對於由黎培理（Antonio Ribeiro）擔任首任教廷駐華公使，羅光的評價是雖不完全滿意，但尚可接受。第二件事是建立中國教會聖統制，中國由過去的代牧區，改為正式的教區，並在每一省建立總主教區。其時有一說稱將來二十教省總主教。皆由中國神職出任，遂有傳言謂羅光將出任漢口總主教，但實際僅北平、南京及南昌三總主教，由中國人出任。第三件事是教宗選定田耕莘為中國首位樞機主教，亦為亞洲首位樞機主

教。羅光在田耕莘一事上無任何著墨之處，因為他們「一夥人」當時屬意的樞機人選是陸徵祥；若非陸徵祥，則應是于斌，他們都未想到教宗選了樸實安靜的田耕莘。

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中國駐教廷第二任公使吳經熊抵達羅馬。羅光其時一度有歸國之念，但幾經猶豫仍在公使館中任教務顧問。吳經熊自抗戰初起，即在大後方從事聖經翻譯，一開始翻譯的是《聖詠》，頗受好評。隨後著手翻譯新約，卻是褒貶不一，主要原因是吳經熊精通英法文，卻不諳拉丁文及希臘文，一些外籍教士認為其能力不足。吳經熊到教廷任職的主要目的，就是因為梵蒂岡有聖經委員會，有疑義時，易找到權威解釋。吳經熊翻譯聖經，羅光是當然的助手。羅光回憶說：「吳公使對於譯經，很下了工夫，所帶來的譯本是第三次的抄定本。我把他的譯本，同他種中文譯本，英法義德各種和拉丁文希臘文本相互對照，遇到有不妥的句子便指出，和吳公使商

酌，他再三思索，然後把句子改定。」熟悉中文聖經發展史的人都知道吳經熊，但沒人想過羅光在翻譯聖經一事上，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二次大戰後中國的局勢迅速的發生了變化，幫忙譯經的羅光，和吳經熊一樣並不是心情輕鬆的。他們不斷接獲的各種國內消息，都使他們憂心於中國局勢。這些消息一部份有關於國共內戰，在民國三十七年以後，中共的優勢愈來愈明顯，而在中共佔領的區域中，各教區開始面臨宗教迫害。教宗庇護十二世面臨世界各地，包括義大利在內共產黨的挑戰時，雖然以強硬的態度對抗，但同時要求各地的教會領導人「堅守崗位」。在堅守崗位的原則下，民國三十七年初，教廷否決了田耕莘赴美的計劃，甚至不答應田耕莘到教廷述職。但田耕莘在各方催促下，在同年六月去了上海，黎培理爲此和田耕莘有嚴重的爭執。同年十二月于斌再度赴美，赴美前先經過羅馬，庇護十二世原不欲接見，但經過羅光向相關

人員疏通後，庇護十二世勉強接見了于斌。中國的局勢在這段期間發生了更快速的變化，黎培理總算同意將各地數百位神哲學修士和年輕神父撤出中國，但離開北平的田耕莘和離開南京的于斌，卻再也回不去他們的教區；在庇護十二世眼中，他們都是沒有照顧羊群的牧人，于斌在羅馬也成了不那麼受歡迎的人物。到了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吳經熊在考慮各種因素，特別是他的家庭因素後，決定辭去公使的職務。而陸徵祥也早在這一年年初去世，羅光所能倚靠的人，過去的指導者，除了剛恆毅，其他人都不在了。羅光留在沒有公使的公使館中，中國政府從駐義大利使館調來一等秘書朱英，擔任駐教廷使館的代辦。

羅光自己描述了這種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場景。他說：「從吳公使走後，銷聲匿跡，在使館只做顧問的事，除使館職務外，我閉門讀書寫作……。在以往國勢興盛時，在各種場合裏，是人來找我，而且很表示親切；政府遷臺以後，找

我的人很少，最多表示一點憐惜中國的同情。」

羅光待在這個沒有公使的使館長達五年之久。其間韓戰爆發，在新的全球戰略眼光下，台灣的情況突然穩定了。然後是堅守崗位的黎培理在一九五一年九月被中共驅逐出境，他一直居留在香港，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以祝聖郭若石為台北總主教為名赴台，並在台北重建「教廷駐中國使館」。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拖延了駐教廷公使的重新派遣，直至一九五四年十月，謝壽康重做馮婦，再赴教廷擔任公使。羅光說：「謝使第二度來教廷……使館身價隨國運而變。失去大陸，遷居台灣，中華民國當時在國際上沒有地位，使館在外交往來上也沒有地位。謝使深居簡出，沒有應酬。」

羅光談到他自己的特殊情況，他說：「剛樞機在傳信部任次長時，常多次吩咐我回國，並且明白說：『你回國傳教，我們好用你。教廷很難派外交官做教區主教。』剛樞機待我，有如父親待

兒子，（這是他老人家自己說的）父親總喜歡兒子升官成名。但是天主的上智，和人的思想不同……有人譏笑我既出世而又入世，貪想作官。知道底蘊的人，也知道這些話是無稽之談。」羅光所謂作官，可能有兩種，一是教會的官，即主教。另一是政府的官，即政府外交官。而所謂底蘊即是教廷不會任命教務顧問為主教，而政府不會任命神職人員為正式外交官。

既然如此，羅光為什麼還要留在羅馬呢？大概可以說是無家可歸吧。

#### 四、台南主教羅光

從一九五零年代至一九六零年代，台灣的政治外交局勢沒有太大變化。但一九五八年十月，庇護十二世去世，威尼斯總主教龍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樞機當選教宗，名若望二十三世。他對台灣教會有更積極友善的作法。他首先任命于斌為籌備中的輔仁大學校長，然後任命田

耕莘爲署理台北總主教；兩位流放美國的中國教會領袖，在台灣都找到了立足之地。同時在中梵外交單位的蹉商下，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升爲大使。然後出乎羅光意料之外，一九六一年三月，他這位兩面不討好的教務顧問，被任命爲新成立的台南教區主教。臺南教區由高雄監牧區分出，以臺南縣市爲範圍。高雄監牧區同時升格爲高雄教區，任命國籍道明會士鄭天祥爲主教。另外同時成立新竹教區，由台北總教區分出桃園、新竹縣市、苗栗成立，由傳信大學秘書長杜寶晉擔任主教。

對於去台灣當主教，羅光的內心是猶豫的。他描述了當他得知消息時的心情：「三月二十四日，傳信部長雅靜安樞機召我到部，當面說明教宗委我任臺南教區主教。我何嘗不想堅辭，但是教宗的意旨就是天主的聖意，我不願違背；而且我堅辭，人家都要以爲我愛羅瑪生活的舒服，怕到臺灣吃苦。我所以雖是急得在部長前流淚，我

還是接受了。」羅光提到他想堅辭，急得在部長前流淚，正表示說去台灣，或說是去臺南，並不是他的意願。對羅光來說，有「自由中國」之名的台灣，真的能讓他認同嗎？一九五七年九月田耕莘樞機首度到台灣訪問，羅光以中文秘書的名義，陪同來台，這是此前羅光唯一的台灣經驗。這時的台灣的經濟以農業爲主，和羅馬的生活比較起來，確有天壤之別，如果羅光並未感受到他與台灣的心理聯繫，回到家鄉湖南，可能才是他真心願意的選擇。但他不可能回到中國大陸，台灣的臺南教區是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同意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羅光、杜寶晉和鄭天祥三位國籍主教在聖伯多祿大殿，由若望二十三世親自祝聖爲主教。這多少參照了一九二六年首批六位國籍主教的祝聖，代表教宗對「自由中國」天主教會的重視。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羅光抵達臺南，當天晚上看道明會神父爲他預備的住所，「房間是上下兩間臥室的小房，上爲我

住。……抬頭一看，樓上在兩房之間又掛著一塊很長的招牌，牌上又寫著『基督教東門佈道所』。招牌周圍虹霓燈甚亮。我乃進房向高公使及鄭主教說明，我不能住在這間房裏，不然臺南市民要以為我是基督教的主教了。……我們又都回到遣使會會所，我遂決定臨時住在會所內。……午夜，我獨自誦玫瑰經，也裏漸覺清涼，熄了燈，登床就寢。心中的氣早就平了，我在心中反而自己笑說：『你看，你就職了，你是臺南的主教，第一天就連住所都沒有，真像耶穌誕生在白冷時，在白冷城找不到住所。』我又答應我自己說：『我比耶穌還強得多哩！我還有人收留，而且所住的還是會所裏最好的兩間房子。』

羅光初到臺南沒有多久，二十世紀天主教會的最大事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開始了。羅光在尚未升任主教前，就在羅馬參與了這次大公會議的籌備工作，會議開始後，又是傳教委員會的要角。他自己說：「我參加大公會議的傳教委員

會，是從第一次會議到最後一次會議；這又是幸中的更幸了。」羅光對大公會議評語第一期大公會議是一次「初學」會議，「誰也不知道究竟大公會議是怎麼開的。」然後大公會議逐漸步入軌道，在其後的三期大會中，逐漸收攏各種有差異的意見。羅光在第二期大會中的一篇通訊，提到對大公會議的觀感：「基督的愛德，教會的需要，常在各位主教的心目中。……我們與會的每位主教，在精神上日有增益，在學識上日有長進，特別是在大會場，我們是用我們的感官，親身感覺、體驗、認識了我們的教會。」至於羅光自己參與的傳教委員會，則完成了新的傳教法令。

在大公會議各期當中，羅光逐漸增加了對台南教區的情感。表現在文字上的，是他在第三第四期，密集的寫信給教區神父，報告大公會議的進行情形。這和羅光對臺南教區的建設也有關係，羅光有行政長才，善於規劃，並能執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號召下，不少海外的國籍神父

陸續加入了台南教區，充實並開展了許多新的工作。這些新神父都是自大陸逃離，五零年代在歐

洲各地進修晉鐸，然後選擇到臺南教區服務。雖然他們不一定住在主教公署內，但在吃飯時間常常聚在主教公署。「同桌吃飯的神父，常是十幾人，中國南北東西的神父都有。北方有河北人，南方有湖南人，東方有江浙人，西方有山西人。」

羅光接著說：「中國神父成了一家人，修會神父也同我們和好，如一家人。南寧街味增爵會士，勝利路耶穌會士，後甲慈幼會士，中山路道明會士，影劇三村的聖言會士，還有新營總鐸區的方濟會士，以及遠在澎湖的靈醫會士，莫不是親親熱熱的。……臺南教區的修女：聖家會、無染原罪會、道明會、仁愛會、……和德蘭文教團都和我合作。」臺南教區的狀況不是特例，而是台灣教會的縮影。被驅逐的外籍傳教士，逃難海外的國籍神父，再加上修會補充的年輕神父、修士、修女，一起擁入台灣，創造了台灣教會五零

年代至七零年代的榮景。

羅光在臺南建造了一座中國式的主教座堂，以「中華聖母」為主保。「座堂依照地形，將是六角形。建築的式樣，將是中國宮殿式。內部的佈置，則是羅瑪大殿的佈置方式。」羅光描述在這中華聖母堂行禮的經驗：「登教座，自居全堂中央高位，一目看到全堂信眾，我自覺身為禮儀的主持人。下祭壇，面對信友，經韻互相應對，知是全堂人一同參與祭禮。捧聖體，舉聖爵，下視高塔的穹空，心有祭祀在天大公之感。我行彌撒已經三十年，只有在臺南主教座堂行祭，我纔體驗到了彌撒祭祀的意義。」

除了教堂的建設之外，羅光為臺南的大專學生，主要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設立了「大專學生活動中心」。這個中心由成大建築系的天主教同學繪圖並監工，羅光向一些神父們借款興建，在羅光就任臺南主教後一年建成。以後台灣教會的一些知名教友，多有出身於此者。為何羅光如此鍾愛

天主教大專青年，他表示：「人家說我在大學教書二十五年，自己愛讀書，所以特別喜歡天主教大學生。」羅光並不否認這樣的說法。另外他還辦了「聖碧岳神哲學院」，同樣在就職一年後開學，

碧岳神哲學院的特色是成年人修院，一開始的六位修生皆年過三十。會有一批年過三十的修生，主要與台灣教會的特殊情況有關。新的傳教區一般而言信仰較不穩定，不易從家庭中產生自幼願修道者；反而是第一代的難民教友，沒有家庭的束縛，從中就產生了有修道意願者。

## 五、台北總主教羅光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羅光離開台南，往台北任總主教。一年半前，田耕莘因身體狀況不佳，向傳信部申請調羅光往台北任助理主教，但期間田耕莘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於是田耕莘決定辭職，赴嘉義聖言會院休養，羅光遂直接接任總主教。羅光一方面對離開台南有些依依不捨，

但他也願意承擔台北總主教這個台灣教會最重要職務的責任。

他在正式接任台北總主教前，在一九六六年三月曾面見教宗保祿六世，當時他曾對教宗提及他對台北總教區的觀察。他說：「台北總教區的國籍神父，來自大陸各省，不是由同一教區修院培養出來的，各人的修養就不相同。教宗勉勵羅光背起這個『很重但很光輝的十字架』，『你的責任就在指揮這個樂隊。』」

一九六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時候，羅光在十二月五日以台北總主教身份晉見教宗。在日記中載：「談大陸紅衛兵事，中共的愛國教會也受打擊。教宗對大陸教會非常關切，惋惜沒有辦法可以救援。」在文革破壞下，中國的宗教活動被迫完全停止，而海峽對岸的台灣，雖然仍處在一黨控制的狀態，但宗教發展卻大致是不受限制的。

羅光此時在與教廷往來上，似乎已逐漸超越

于斌，成爲說話更有份量的中國主教，部份原因在於其與保祿六世的私交。自保祿六世任教廷國務次卿時，羅光即與其有密切往來。當選教宗後，羅光每往羅馬，除按正常程序覲見外，若羅光私下請見，保祿六世往往亦破例接見。一九六九年三月，羅光單獨覲見教宗，談話二十分鐘，「談義大利擬承認中共事，馬尼拉真理電台向大陸廣播事。」最後又告知將要發表新樞機主教，候選人有二，一爲于斌，另一即羅光。教宗說：「以你所有以往的工作，和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認爲你有資格。不過現在尚未決定，將來由傳信部表決。無論如何，我們希望你知道你常在我們心中，將來未被選，我們仍看重你的功勞。」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教宗宣佈了三位新樞機名單，于斌名列首位。教宗的談話多少已暗示了將選于斌，羅光心中多少有些失落，但羅光也從教宗對他的肯定，期待另一次擔任樞機主教的機會。

在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三年之間，因國際對中國的重視，梵蒂岡與「自由中國」的關係也逐漸發生變化。首先是一九七零年保祿六世出訪菲律賓，再訪澳洲，回程順道訪香港。台灣的「中國主教團」先是爭取保祿六世亦順道訪台灣，不成後，則希望教宗亦不訪香港。在過程中，于斌及羅光皆往羅馬遊說，其中尤以羅光爲要角。這次的遊說沒有太大效果，因爲保祿六世希望能藉香港行，開啓與中共的對話。

接著是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中代表中國的席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教廷駐華大使葛錫迪（Edward Idris Cassidy）總主教當天即離開台北，名義上是回澳洲度假，實則回到教廷，與國務院成員共商此變局。這是駐台北的教廷使館自一九五二年十月設立後，首次有撤離徵兆。羅光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梵蒂岡見了保祿六世，羅光聲稱他遺失了這年的日記本，他只記得保祿六世向他說：「第一，在政治上，

將把台灣蓋住，隱藏起來。但在教會方面，將特別提高台灣教會。第二，如果中華民國政府以任何名義，想再進聯合國，教廷將予以協助。」然後隔年十一月，羅光再往教廷，首先見國務院兩位次卿，建議已赴孟加拉任大使的葛錫迪總主教，仍兼駐台北大使，這是教廷不易拒絕的折衷選擇。這個建議到一九七四年被教廷正式採納，教廷保留了駐華大使的名義，但大使不在台灣；教廷駐華使館的業務，由一位代辦負責。一九七八年美國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後，這位名義的大使也取消了，但由代辦主持的教廷駐「中國」使館，仍在台北運作至今。而在此期間，台北總主教羅光是溝通協調的要角。

在地方教會的傳教工作，羅光比較台南和台北兩地的差異：「臺北的環境和臺南的環境不同……臺北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政府機構林立，教區則已成立有年，堂區多為本堂主任司鐸草創，教區工作已有成規。另外一種情形，是在梵

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後，一般改革的風氣，吹翻整個教會，大家以為不必拘守法條，司鐸得有教宗核准，還俗結婚者，一時全球幾有壹千件。臺北還俗結婚的神父多有其人，而且多為青年才俊。修女還俗者亦不少。」神父修女還俗，不只在台北總教區，也是當時台灣教會的普遍現象。羅光認為：「組織教友參加教會工作，是我在臺北的主要工作。」羅光根據梵二的傳教法令，在民國六十年創立「教友傳教協進會」。開始時阻力很大，「傳統派的神父認為教友的組織已經很多，不要再加上一種新的組織，而且教友傳教在傳統裏沒有；維新派的神父則認為這種組織應由教友自覺，由教友發起，由下而上，不由上而下。」無論如何，教友傳教協進會現在已經是全台灣各堂區普遍性的組織，其功能視其與本堂神父的關係而定。

在硬體建設方面，羅光在台北市樂利路興建了主教公署。羅光解釋了主教公署建築形式的意

義：「公署爲四方形，聖堂位居全樓最高層的中央，祭壇又位居聖堂中央，聖體櫃又位居祭壇的中央，全樓的中央，便是耶穌聖體，這是代表以耶穌爲教區一切事的中心。」與臺南的主教座堂類似，樂利路的主教公署同樣是中國式的建築。與主教公署樓房相連，建有「友倫樓」，係各種教友組織辦公處所。

## 六、輔仁大學校長羅光

一九七八年八月于斌樞機主教交卸輔仁大學校長職務，由羅光總主教繼任輔大校長。本文對羅光校長對輔大的貢獻不多贅述，但讀者必須了解，擔任輔大校長並非自總主教職務退休後的閒職，當時是地位更崇高的教會職務。

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七八年即位之初，外交政策基本上聽從代理國務卿卡薩羅里（Agostino Casaroli）總主教（不久即升樞機主教）的獻策，意在不觸及台灣教會與中華民國政府，

而逕自與中共談判建交。在卡薩羅里的主持下，各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開與秘密的接觸增加，若望保祿二世也藉著各種機會對中國發言。一九八三年是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從羅馬到亞洲，相關的慶祝活動早在前一年即已開始進行。羅光以「中國主教團」主席的身份，也從一九八二年開始準備一系列的大型教會活動。最主要的活動是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共有學者專家四十餘人發表論文。幾乎同一時間，教廷國務卿卡薩羅里樞機在菲律賓馬尼拉，主持利瑪竇抵華四百週年的慶祝彌撒，而來台的教廷代表則是傳信部秘書長盧杜沙彌（Simon Lourdusamy）總主教。教廷國務卿去菲律賓此一與中國無關之地，主持慶祝利瑪竇的活動，而來台的則為次長級官員，以羅光為首的「中國」主教們都甚為不滿，感覺台灣教會被「蓋住」、邊緣化了。

趁盧杜沙彌總主教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在台時機，主教們與其開閉門會議，表達對教廷處理中國事務的不滿。羅光並以義大利文起草座談備忘錄，大意是：大陸愛國會爲中共的工具；對大陸忠貞教會應予鼓勵；外國人士僅與愛國教會接觸，不明瞭忠貞教會及中國真正情形；中華民國主教係中國人，對大陸中共及教會人士之心理，能夠明瞭；如外國人可關懷大陸教會，中華民國的主教更有權利關心並協助，不能因怕中共而不許。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台灣主教們的備忘錄甚爲重視，乃邀台灣主教往羅馬當面溝通。一九八四年二月台灣主教們陸續前往羅馬，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十七日兩度由國務副卿西爾握里義（Achille Silvestrini）與主教們開會。羅光日記中載：「西爾握里義副卿提出教廷與中國使節問題，說明教廷使節爲教務而不爲政治，爲教會而不爲政府。彼認爲若斷絕與中華民國之外交關係，可

使中共無所藉口，如其不與教廷接觸，則罪在彼等。余答此時斷交，絕非其時。因大陸忠貞教會將受打擊，信德亦將迷惑，台灣方面更在心理上將遠離教宗。如教宗派宗座代表駐台灣，亦將不受歡迎。」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教宗接見台灣七位主教，親自聆聽羅光代表台灣教會表達意見。約半小時後，教宗與主教們進入大廳，廳中有百餘旅居羅馬的中國（台灣）神父、修女及教友在等待，教宗以英語發表「橋樑教會」演講。教宗首先強調「你們常在教宗心內」，演講中最重要的話：「你們在台灣和在海外的天主教教友，你們的美妙任務是做大陸同胞的『橋樑教會』。那裏暫時像埋藏在田裏的種子的其他基督信友兄弟姐妹們，將接替下去。畢竟這一切努力和犧牲不會毫無結果，日子快到，那時將以更有形的方式，經由教會所敬愛的整個中國的文化，期望和期待，來宣報並慶祝耶穌。」經由羅光等台灣主教的爭

取，台灣及海外華人教會，在與大陸教會的關係上，取得了「橋樑教會」的定位。時間也證明，這些台灣的「中國」主教對大陸政教關係的觀察，比「外國人」及教廷外交官準確。

若望保祿二世是一位經常出訪的教宗，但台灣教會領袖在一九八四年以後已了解，為顧慮大陸教會情形，教宗不太可能在未訪大陸教會前，先訪問台灣。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外交戰中，有愈益增加的焦慮感，於是願藉若望保祿二世第三次的亞太之行，邀請教宗在台「小停」。羅光記下他在一九八八年年底被政府邀請擔任說客的過程，名「一度作使」。他說：「我明知這事很難有結果，但不便事先退縮，乃接受李總統委託，往羅馬一度作使。」教宗在接見羅光時明白表示：「時勢尙未成熟，中共將認為訪問台灣為一種敵意的表示。」「時勢一到，余會來台灣訪問。」這時的羅光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來回機上都用氧氣」。他在出發前與

當時的花蓮主教單國璽商量，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單主教也前往教廷覲見教宗，這代表了世代交替，在中梵外交方面，單國璽逐漸取代了羅光。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各校學生運動盛行，輔仁大學現任校長黎建球有如下的回憶：「一九八八年臺灣正值總統選舉，各界對改革之期望至深，乃集合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向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先生請願，頗有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味道，大學生在這些請願活動中扮演了極為積極的角色，頗令各大學校長憂心。輔大學生當然也不例外，羅總主教乃在三月中去探望他們，羅總主教一方面和他們在一起，一方面也同時要求他們儘快返回校園，當時，輔大學生也很爽快的向校長報告：見到了總統，訴說了心願之後，就會返回校園。而學生們也真的如同所答應校長的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返回了校園。」

第二年，一九八九年五月大陸天安門事件發生，台灣的學生為聲援大陸的學運，群聚在台北

市的中正紀念堂，學運期間羅總主教也會經兩次親自去看學生，和他們坐在一起，支持他們，鼓勵他們，並聆聽他們的心聲，但也要求他們要主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羅光是一位愛國的主要，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政府唯命是從，在正義公平和人權方面，信仰才是他心中的量尺。

## 七、結語

羅光八十一歲退休後，長住天母牧廬，但仍 在輔大及文化任教。一九九六年後頗為病痛所 苦，多半時候在台北榮總病房中度過，不能說話，但仍能思想，寫作短文成篇，稱為《病榻隨筆》。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他去世前的最後一個生日，我帶著與江國雄先生合撰的《中梵外交關係史》到榮民總醫院見他。當日他的訪客學生齊集病榻之前，我沒多說什麼，靜靜的放下書後離去。後來公共電視播出他的「聖堂學者」專輯，在影片中，不能言語的

羅光，在他的畫板上有「中梵」等字影。

這位與民國同歲，因緣際會來到羅馬三十二年，在台灣定居四十三年，但鄉音濃厚的湖南人，如果不是民國歷史的偶然，如果不是政教問題的交纏，其實不會有如此傳奇，或亦可謂有些荒謬的人生。所謂荒謬的意思是，羅光若生在太平盛世，他或是一代名儒，或是湖南當地的大主教，但絕不是台北總主教或台北縣新莊輔仁大學校長。羅光有很準確的自我評估，他清楚自己創造的歷史，所以本文的材料絕大部份皆為羅光自己的敘述，並在其生前出版。其名曰《牧廬文集》，以後更和其它哲學著作合編入《羅光全書》。本文的作者其實是羅光自己，他知道很難會再有這麼精彩的傳奇。我只是私下揣度，完成他在病榻前要我做的編輯工作而已。

□